

ОСОБАЯ И СЛОЖНАЯ ПРОБЛЕМА

— ХРОНИКИ ОТДЕЛЬНЫХ СОБЫТИЙ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ИНТЕ-
РНАЦИОНАЛОМ, СССР И КПК

1919—1991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

周文琪 褚良如 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

周文琪 编著
褚良如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

周文琪 编著
褚良如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2印张 5插图 51.2万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40

ISBN 7—216—00968—1

D·250 定价：12.70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3
一、共产国际初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19年3月—1927年7月)	5
二、共产国际中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27年8月—1935年7月)	153
三、共产国际后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35年8月—1943年6月)	268
第二部分 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中苏关系	407
一、共产国际解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3年7月—1949年10月)	409
二、中苏友好合作全面发展 (1949年10月—1957年)	463
三、从友好合作到严重恶化 (1958年—1969年)	511
四、为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而努力 (1970年—1981年)	558
五、从中苏关系有所改善到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恢复正常化 (1982年—1991年)	619
参考文献、书目	696

前 言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成立到1943年6月正式宣告解散，历时近1/4世纪。它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战略策略、方针路线对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它解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整个国际政治的格局仍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发展到严重恶化、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这一曲折演变的历史过程。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格局。因此，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不顾或忽视这一内容极其丰富、而其中许多事件的因果关系又极为错综复杂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党史方面的许多问题就会说不清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被“禁锢”的这一课题的研究终于被突破，并且引起党史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因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联系，从一

个更加广阔、深入和更高层次上，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中国共产党已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准确地、实事求是地总结70年里我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苏联的关系，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在当今国际共运正处于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正发生剧烈演变的形势下，就更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尽管如此，目前研究这一课题仍有很大局限性。近年来研究工作虽有很大进展，但系统地积累资料还很不够，有关档案资料目前还处在发掘、收集和整理过程中。这部《编年史》，只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这一课题时，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指导下编写出来的。它试图为关心和研究这一课题的读者提供一些线索。其特点是：1. 以大事纪要体裁编写，但从头至尾有紧密的连贯性；既按年、月、日分条目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又按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以看出在各个历史时期围绕某些中心问题展开的矛盾斗争。2. 具有较为方便的可查性，可以不必查找浩繁帙卷，便能一目了然地查阅有关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工具书。3. 紧紧扣住共产国际、苏联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主题，除了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般重大事件外，着重于挖掘近些年来新发现的重要史料。但所收资料可以肯定地说是很不完整的，有待于将来继续补充、提高。

在编写过程中，较多地参考和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有关资料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研究成果，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错误和疏漏，恳请读者指正。

第一部分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初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19年3月——1927年7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不少的指导 and 帮助。当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有错误。

具体有哪些帮助呢？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二条，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大会通过的其他有关文献，对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确定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方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也是共产国际提出的。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路线、方针的指导上，在这次革命的初期和中期（1924年—1926年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帮助和推动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成为当时革命武装的基础。苏俄还派来了大批军事顾问和教官，源源不断地给军校和国民革命军运送枪械弹药以及经费等。

共产国际、苏俄的以上这些援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迅速取得胜利。

但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也有错误的东西，从根本上说就是他们轻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的力量，而重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力量，这就是当时他们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根本性错误。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不能不直接影响导致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使这次革命遭到失败。诚然，从我们党来说，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认为首先要由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负责。这是因为照搬照抄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1919年

3月2—6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30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代表。俄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契切林等。列宁宣布大会开幕，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就此问题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完全接受列宁提出的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共产国际纲领的基本原则。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宣言明确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腐蚀性的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的胜利”。大会以后，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来办理，这个执委会由俄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党各选一个代表组成。执委会选出5个人组织政治局（执行局），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普拉廷、拉科夫斯基（都是俄国人），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

3月3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契切林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侨居俄国的中国工人团体将要到会。在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记录中，关于中国代表的记载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刘绍周、张永奎同志，享有发言权”。刘绍周又名刘泽荣，是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张永奎是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他们是应苏俄外交部的邀请参加大会的。列宁在大会期间，曾亲自接见了中国代表。

3月5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中国代表刘绍周向大会读了祝词（先用汉语发言，然后改用俄语）。他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之后，指出中国在孙中山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情况。最后他说：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5月 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摘译文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最早的全译文。与此同时，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刊载了8篇介绍有关马克思生平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在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文章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

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仍有极重要的意义。

5月4日 中国爆发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从此，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是在中国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条件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发生的。它的直接起因是巴黎和会蛮横地拒绝我国提出的收回山东省主权等正义要求。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6月3日 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接着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此外，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厦门、安庆等地工人和商人，也先后举行了罢工、罢市或示威游行。从此，五四运动就超越了知识分子范围和地方规模，而成为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7月14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办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出版，由毛泽东主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热情地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广泛地介绍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的时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他还阐述了依靠工农劳苦群众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民众革命大联合思想。

7月25日 由苏俄政府外交委员加拉罕签署发表《对中国国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表示：“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立那样的国家，采取那种政权，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路

矿产、林产等权利，及全部由俄罗斯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退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不过，当时历史上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大部分还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匪谢米诺夫手中，宣言实际上是要中国政府采取反对谢米诺夫的行动。

夏 俄共（布）老党员后来成为联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负责人的布尔特曼，从外国干涉者占领下的海参崴来到天津。会见了李大钊并与他建立了某些联系。

9月16日 周恩来等联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建立了天津的进步团体“觉悟社”，随后并出版了《觉悟》杂志，逐步地展开了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天津《觉悟社》经常号召人们铲除军国主义，铲除资产阶级、军阀、官僚，铲除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改革男女不平等的思想和旧制度，并经常组织成员研究世界各种新思潮，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它还同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联系，请他们到天津讲演。

11月19日 列宁接见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同他讨论了中国革命和华工联合会的工作。

12月12日 北京政府采取积极反苏立场，致电新疆督办杨增新称：“‘过激派’声势渐大，各国有与谋和之意，望酌度边情，妥为对付。”又称：“对俄国方针，院部联席会议决定联络民主党，严防‘过激党’，分电各边照行。”

1920年初

1920年

初 伊尔库茨克、海参崴等地均被红军占领。俄国苏维埃政权在远东地区重新得到巩固。

2月17日 北京政府宣布撤回侵俄军队，并派出边防军负责人张斯馨与苏俄联系，封闭两年之久的中俄交通重新打开。

3月初 北京政府通令各地严密“防堵”“过激主义”（指“布尔什维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军界、学界由苏俄入境者，以及邮电都作出防范规定，并具体开列要查禁的出版物83种和要严密防范来华的德籍、俄籍“过激党”人共11名。

3月1日 苏俄共产党（布）宣布对外方针，表示放弃下列数项权利，完全交还中国：1. 中东路1060英里；2. 资金66200万卢布；3. 吉林省东北部之煤矿；4. 扎兰诺尔煤矿；5. 海拉尔附近吉拉岭金矿；6. 外蒙古图拉河畔之金矿；7. 1858年璦琿条约所载之松花江航行权；8. 吉林石头河一带森林区。

3月 共产国际接海参崴方面电报，知道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很为重视。共产国际决定派维经斯基率代表团到中国，代表团成员有他的妻子库茨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

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的记载，维经斯基来华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4月 维经斯基等到达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两个俄籍教授柏烈威和伊凡诺夫（即伊文，中文名伊风阁）介绍，与北大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会晤，并在李大钊支持下，同许多进步人士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进行了多次座谈，

向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使他们对于苏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维经斯基在北京与共产国际另一成员、来自海参崴的布里亚特族人萨赫扬诺娃会合。通过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很快去上海，准备找陈独秀商量建党问题，马迈耶夫则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维经斯基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建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织。随后，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也陆续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4月 苏俄《对中国国民及中国南北政府宣言》于去年7月发表后，当时北京的反动政府借口要与“协约国一致行动”始终置之不理。这时宣言冲破北洋政府的封锁，在国内发表，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对苏俄的复电，计有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宁波同乡会、上海法界商界联合会、国会议员（全体署名）、杭州学生联合会、中华世界救国总团、中华劳动公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以及中华救国十八团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旅沪四川同乡会、四川旅沪联合会等。发表评论表示感谢苏俄援助及督促政府觉悟的报纸，计有天津《益世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救国日报》、《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正言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等。

4月6日 根据列宁的倡议，苏俄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在上乌丁斯克宣布成立。它是苏俄为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在苏俄和日本之间，建立的一个“缓冲国”。它和中国接壤，成了苏俄对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和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建立

联系的前进基地。这时苏俄远东与哈尔滨的铁路联系开始恢复。北京政府和远东共和国都准备派出使团，沟通关系。

4月24日 苏俄采取主动措施与北京政府代表谈判签订商约，以促进中苏邦交。其主要内容为：1. 为谋两国通商起见，开放中俄两国国境；2. 承认苏俄政府对于中东路固有之权利；3. 保证中东路沿线中国军队的撤退；4. 中国和谢米诺夫军队不得通过中俄国境；5. 即行恢复中俄两国之外交关系。苏俄方面表示的立场，同第一次对华宣言比较有了明显的后退。

5月1日 《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新青年》还发表了《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专论》和加拉罕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号召工人阶级觉悟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同时，还号召广大的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当中去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传播马克思主义。

6月5日 列宁发表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的《提纲》及“二大”通过的其他有关文献，其主要思想是：1.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2. 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的组织；3.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4. 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5. 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

7月1日 苏俄政府协助在俄华工设立华工学校，华工十万余人的代表在莫斯科召开大会，致电孙中山，请求：1. 协助中国青年革命事业；2. 承认苏俄并反对与帝国主义共同干涉苏俄；3. 即派代表与苏建交；4. 批准华侨回国。

7月 俄共（布）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工作。

7月19日—8月7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俄国彼得格勒召开，7月23日移至莫斯科举行，至8月7日闭幕。会前，列宁发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为大会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任务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土地问题提纲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参加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是刘绍周和安恩学，他们所代表的政党是“中国工人党中央局”即“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鉴于加入俄共（布）的中国党员迅速增加，需要建立一个中央机构的统一领导，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党员小组建议成立这样的中央机构。1920年6月25日，即大会闭幕后第二天，便建立了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

根据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记载，“‘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是俄共（布）外国部的组成部分。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中央组织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唯一中央机构。”“该局拟定了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